

浅谈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作家创作思想局限

冯炳发

(台州学院, 浙江省台州市, 318000)

摘要:当代中国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日益下降,除了社会环境外部因素外,作家对文学认知的思想局限严重限制了文学的繁荣发展,本文从中国当代作家的伤痕思想倾诉局限,当代作品的文学容量局限和偏离现实文明局限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

关键词:作家,创作思想,局限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类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文学危机,这种危机最直接,最深切的表现文学读者群体的锐减和文学作为大众文艺其艺术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和作为思想媒介其传播性的严重受限。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不仅没能幸免于难,而且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这种生存困境的形成是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客观方面最主要的因素是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娱乐形式,信息获取手段,思想交流平台更趋多元化,新兴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文学在精神提升,文化传递,大众娱乐等方面的功能垄断。而人们在生活节奏,工作压力等现实压抑的作用下的现实考量中更愿意选择快捷,轻松,更富娱乐性的其他文化传播形式,这在客观方面导致了当代文学的衰落。

相较于主观因素,当代作家创作局限性所主导的主观原因,才是当代中国文学衰落的致命伤(就在传统文学呈日落西山之景时,网络文学却一片欣欣向荣,如果不拘束于文学地位争论,网络文学中可以找到很多优秀文学作品)。

创作局限的根源很大层面上可以追溯为作家的思想局限。笔者重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作家的思想局限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 伤痕思想倾诉局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活跃期几乎是伤痕文学的天下,伤痕文学在展现文革时代生活图景,挖掘特殊时期人性本质,以及突破意识形态审美一元化方面有很大进步。但是,伤痕文学作家们所展现出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伤痕文学这个称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作家群体创作思想不理性的表现,正是同时代的作家人人控诉文革,人人倾诉伤痕,才形成了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是靠表达主题的高度一致性而形成的。显然,这样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带有客观的运动性质,文学运动席卷了当时的整个文坛,直接导致了同时代文学作品内容表达的单一性,严重滞后了当时中国文学的主题创新与思想创新。

究其原因,是作家本身不能走出个人悲惨经历而寻求个人苦难履历倾诉的思想局限。伤痕文学的作家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在文学创作中通过对个人经历的描述批判文革,反思文革。但在更深意义上,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历史问题与个人经历进行文学解构时,首先应该是理性思考,然后才是文学性的表达。这种理性化的思考至少应该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原因的时间追溯和表象的空间近察。所谓自身的苦难经历或者周围人的伤痕,抑或

是当时的社会图景，人情关系，只是在空间近处的表象描述，没有触及到根本。要深刻的发掘真相，需要作家真正考察滋生苦难的文化土壤和割裂伤痕的封建心理。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东西在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能真正打动读者，震撼心理的正是这些东西。

自伤痕文学成就了一大批作家以后，很大一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都热衷于文革叙事或者苦难叙事。直至到现在改革开放整整 32 年，很多依旧没有走出苦难叙事怪圈，如 2011 年出版的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2010 年出版的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等，这些作品的出现固然有它的文学价值。但是在正在经历文化大转型，价值大碰撞的 21 世纪不去主动捕捉新时代的文学主题，不去主动关注新时代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却流连于自身伤痕安慰和民族苦难回忆，在人类文明的大进程中缺位，这不能不说是目光短视或者灵感钝化。

二 作品文学容量局限：

文学的普遍范围一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杂文（包括文艺性时评）等。但在当今中国文坛，通常情况下对作家的内涵定位一般局限于小说创作者，而作家本身所发挥出的创作功能也局限在小说的创作上面。如诗歌，散文，杂文等领域几乎成为实力作家所边缘化。而剧本的创作主要表现在电影剧本和电视剧剧本创作，大范围的商业化让它很难入围严肃文学范畴。

不能笼统的说“独尊小说，边缘其余”的文学格局的优劣，长篇小说作为最大容量的文学体裁受到作家和读者亲睐自然有合理之处。作家们普遍认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功底的最合理标准，而小说创作水准的最高基准首推《红楼梦》。很多作家都在仰望《红楼梦》的艺术高度，但仅仅是仰望而已。自五四以来对传统古典文学不遗余力的批判中，很少有作家能理性的吸取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当代有的作品不顾诗意渲染和风景描写对人物塑造和心理刻画的重要性，几乎完全摒弃了在作品中柔和诗意旁白与环境渲染的写作手法。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作品本身敏锐的捕捉到了新时代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朴实幽默的语言描写也使作品的有了较强可读性，但是一味的平白叙事，使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当代小说比起古典小说来在作品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容量上要狭隘很多。以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为例，它之所以是部伟大的小说，恰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将中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的文化价值都有效的运用于庞杂的故事结构中，极大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与功能外延，真正体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完美统一。

作家既然选择了具有容量承载优势的小说作为创作体裁，就应该充分利用小说的容量优势，在关注人性发展，表现社会文化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尽可能的拓展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只有这样文学才能与时俱进，永葆活力。

三 偏离现实文明局限：

（一） 人性剥离局限：

20 世纪小说是人性与政治性既合作又疏离的矛盾发展过程。从人性的被贬抑到人性的极度张扬，人本质中的那些沉渣纷纷泛起。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利用叙事学、传播学双重视角，揭示新时期小说从发轫到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嬗变，在人性与政治性、阶级性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发掘人性在小说中成长的历程，从而构建关于“人性”的整体话语网络。【1】

人性发掘首先得承认人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虚幻性的表现为心理层面的善恶欲

恋，更现实的表现行为层面上的道德约束和欲望节制。作家对人性的发掘应该基于道德与节制的社会框架之上，而不是去塑造不顾一切极端纵欲满足欲望的脱离人类文明框架的“怪人”，这种塑造其实是在生硬的剥离人性与社会的和谐融合，不仅对人类文明发展（包括文学）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反而适得其反，催生人性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进而阻碍文明的理性发展。

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程度决定于人类对自身欲望的柔性约束与对未知事物的理性认知程度。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任何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社会人无一不受社会行为准则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在各个国家基本上也大同小异。作家如果无视人类理性共识的存在就容易剑走偏锋，笔下的作品完全成为自己主观臆想的附庸品和自己极端情绪的发泄筒。作家将自己的臆想与情绪化误当成灵感来源，创作出的作品必然没有美感水准，道德底线和价值立场，更不会有艺术高度。

这方面的例子是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作家阎连科虽然承认“我本意并不是要讽刺‘为人民服务’这种说法，而是讽刺没有做到‘为人民服务’的人（2005年5月）”。但是用极端放大人性欲望的方式对人性的断章取义，明显偏离了文革背景下的人性复杂本质。对人性的片面解构很难得到读者的理性认同，也失去了现实意义。其次，作者将凝聚着新中国崇高理想的政治标语穿插于卑劣低俗的人欲表达中的极端化对比叙述，严重背离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认知标准。挑战社会承受极限和超越心理承受水平的作品必然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情色偏执局限

“陕军东征”中两部有影响力的作品，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作者的主题并不是性爱，但却以赤裸裸的性过程描写而饱受非议，这种写作形式以及背后的理论支持很大层面上移植于西方价值判断标准。虽然作者本身都解释说自己的性描写不是以吸引读者为前提，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品的“性存在”是作品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既然客观现象已经发生，这种事后的主观解释显然意义不大。

长时间以来，文学评论界对严肃文学作品中该不该存在赤裸性描写一直停留在是不是基于作品本身情节发展需要的理论层面，而鲜有人问津这种赤裸描写的现实社会的影响和读者的理性接受程度。中国文学作品首先是面对中国的读者，而绝大多数读者本身又是公开性禁忌的认可者。评论界的在没有顾及读者理性认可的一元评价体系下公认的所谓优秀作品和所谓合理写作在现实文明层面究竟有多大意义，这值得质疑。

（三）迷信西方价值标准局限：

每种文化的成长都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土壤之中的，文学既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即具有文化价值属性。文学又承担了传播文化的使命，又兼具文化载体功能。上述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学的繁荣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交流互补。文化载体属性决定了文学应该具有文化输出属性。这一进一出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关键在于对文学属性的正确认识和西方价值判断标准有选择性的取舍。

生死欲念是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小说家写人生无非是五大事件：人物的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2】。与西方文学关注个人纵向发展有所不同，中国古典文学更倾向于表达群体的政治选择与集体的民生关注，这种主题表达的延续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而断裂。从鲁迅对民众思想的关注从而积极创作杂文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的中国文学，都是在延续集体价值观的表达。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在表现主题上大规模摒弃了传统古典文学经验，大踏步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靠近。从 80 年代先锋作家对表现形式的热情探索，到新生代作家对自我意识的过分渲染，均是在西方价值标准影响下的文学重塑。而作家这种一厢情愿似的重塑如果忽略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精华的有效继承就会与读者受众的价值标尺相互冲突，从而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推广与传播。

不管任何时期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取向，甚至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作为一种普遍标尺来衡量个人的思想境界。所以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才能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包括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世界现实主义巨匠都会被中国读者所熟知。而西方价值判断中的欲望合理理论，自私合理理论在西方国家以利益驱动机制为基础的竞争文化中能够合理存在，然而在强调道德与节操的中国却不会得到文化认同。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当代作家孜孜不倦的突破思想禁区 and 题材禁区却鲜有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文艺精品问世。

五 结语：

诚然，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所以，文学艺术的评价必须考虑其社会价值。文学的社会价值最重要的体现在文学作品被广泛的读者认可后对其精神以至人类文明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文学繁荣的主体不仅仅是作家极其作品本身，更应该包括读者受众。文学作品只有在得到广泛的读者受众的认可和好评并社会化推广后才能体现出作家创作的社会意义。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从作家角度来说就应该突破自身思想认知局限的限制，努力回归现实关注，丰富自身作品的文学容量，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 作者：郝春涛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I S B N : 7209056718

[2] 生死欲念：西方文学永恒的主题 作者：张永义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ISBN: 9787503942082

Discuss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ture shallowly the writer creative
idea limitation

Feng Bingfa

(Taizhou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Taizhou,318000)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ture social influence drops day by day, beside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xterior factor, the writer limited the literature prosperity development seriously to the literature cognition thought limitation, this article poured out the limitation from the Chinese present age writer's scar thought, the contemporary work literature capacity limitation and the deviation realistic civilization limits three aspects to elaborate this question.

Keywords: Writer, creative idea, limitation